

見證

历史的见证

『文革』

人民出版社

的终结

薛庆超 著

彭德怀在「软禁」中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给侄女彭梅魁保存。他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中国人民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老师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历史的见证

薛庆超 著

“文革” 的终结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01-007290-6

I. 历… II. 薛… III. 文化大革命-史料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9269 号

· 历史的见证

LISHI DE JIANZHENG

——“文革”的终结

薛庆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75

字数:440 千字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978-7-01-007290-6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逆水行舟

1. “所谓‘毛派’的头子”

2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封来信上批示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婚变”。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错误开展“党内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24

对于批判吴晗、罗瑞卿、彭真，邓小平不能接受，这种反常的政治批判和置人于死地的做法，使经历过几十年政治风浪的邓小平也感到难以理解。

然而，他同情罗瑞卿、彭真，却又无回天之力，只能采取回避的方式。后来，他回忆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

3. “文革”的全面爆发 32

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毛泽东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与刘少奇身陷逆境，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4. 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和升级 45

邓小平在违心地检讨“错误”的同时，为了保护大批干部，把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对于未来的政治命运，邓小平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这也是他在当时形势下可以采取的唯一选择。

5. 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62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6.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73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听上级传达中央文件。在听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后，邓小平静静地听工人们讨论，没有讲一句话。直到回家以后，他才十分兴奋和激动地说了一句令家人难忘的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7. 邓小平复出始末 99

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严酷的事实不能不令他进行深刻的内省和反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在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顿时，他成为宴会中最引人注目的

人物。

8. “人才难得” 107

邓小平健步登上联合国讲坛，庄严宣布：中国将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从联合国载誉归来，毛泽东更为倚重。每当毛泽东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时，总能看到邓小平的身影。

9. 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 124

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忍无可忍，反击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要平等嘛，问题还没搞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罢拂袖而去。

“四人帮”经过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江青还公然向毛泽东伸手要权，妄图由她来“组阁”。

10. “三项指示为纲” 152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在这次整顿中“用了几个人才”，即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和周荣鑫。他们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气概，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11. “评《水浒》”风波 186

周恩来语意深重地对工作人员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了。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

面对江青集团的肆意诽谤，周恩来心中充满了悲愤，他在以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向国际社会表示他对邓小平寄予的厚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

砥柱中流

1. “反击右倾翻案风”

200

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2. 不断升级的错误批判

216

“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后，全国形势迅速发生逆转。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和周荣鑫被“四人帮”诬蔑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分别受到点名批判，停止了领导工作，再度成为“靠边站”的人物。

3. “天安门事件”

225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中国人民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老师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叶剑英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这一天，他在住地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轻声朗诵起高尔基的名篇——《海燕》。

4. “你办事，我放心”

256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自己正式成为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5. 粉碎“四人帮” 263

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商定：采取果断措施，将“四人帮”一网打尽。叶剑英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既要果断，又要周密，要确保万无一失。

6. “两个凡是” 280

尽管华国锋对叶剑英极为尊重，一时世人曾有“红花绿叶”之说，隐含“红花虽好，仍需绿叶扶持”之意，但对于叶剑英提出的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意见，华国锋却没有采纳。

然而，历史的发展在召唤邓小平，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工作已是大势所趋。

7. 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294

邓小平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从某种程度上一下子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和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中国青年的命运。一时间，洛阳纸贵。由于纸张短缺，最后中央决定，挪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来印高考试卷。在那个年代，这可算是最高待遇了。

8. 真理标准大讨论 308

邓小平对这场讨论明确表示肯定和支持，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9. 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313

1978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阐述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拨乱反正

1. “抓纲治国”

338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给叶剑英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然而，当时华国锋提出的指导思想却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抓纲治国”，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2. 转折的前奏

345

1978年4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组织学员讨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和序幕。

3.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350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面对种种压力，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要有人下嘛！”

4. 为习仲勋、彭德怀翻案

359

彭德怀在“软禁”中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给侄女彭梅魁保存。他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5. 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369

邓小平指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了，这还了得？”在这种情况下，

胡耀邦断然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只能另起炉灶！

6. 全面调整社会关系

383

曾有人问胡耀邦，为什么给右派平反要搞“一风吹”？胡耀邦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有五十多万，再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其中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如果要一个一个地甄别，得有一批人去干。如果不一风吹地平反，估计十年都平反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

7. 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396

当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以思想战线为突破口，率先向“两个凡是”的错误发起进攻，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斗争时，得到了老战友罗瑞卿旗帜鲜明的坚决支持。

8.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414

华国锋提出了辞职的要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叶剑英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毛主席去世后，我确实把华国锋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9. 拨乱反正，重铸辉煌

429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从此党和国家走上了正常的健康的顺利发展的轨道。

跋

432

1. “所谓‘毛派’的头子”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文革”的全面爆发
4. 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和升级
5. 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6.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7. 邓小平复出始末
8. “人才难得”
9. 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
10. “三项指示为纲”
11. “评《水浒》”风波

逆水行舟



1. “所谓‘毛派’的头子”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封来信上批示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婚变”。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错误开展“党内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讲道：“我是‘三落三起’。”^[1]

一位名叫乌利·弗朗茨的德国人也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革命的道路是不会像涅瓦大道一样笔直平坦的。

人生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有志于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的人们，首先要作好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的准备。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落一起”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并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31年夏天，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对于在瑞金期间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

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

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军民热情是很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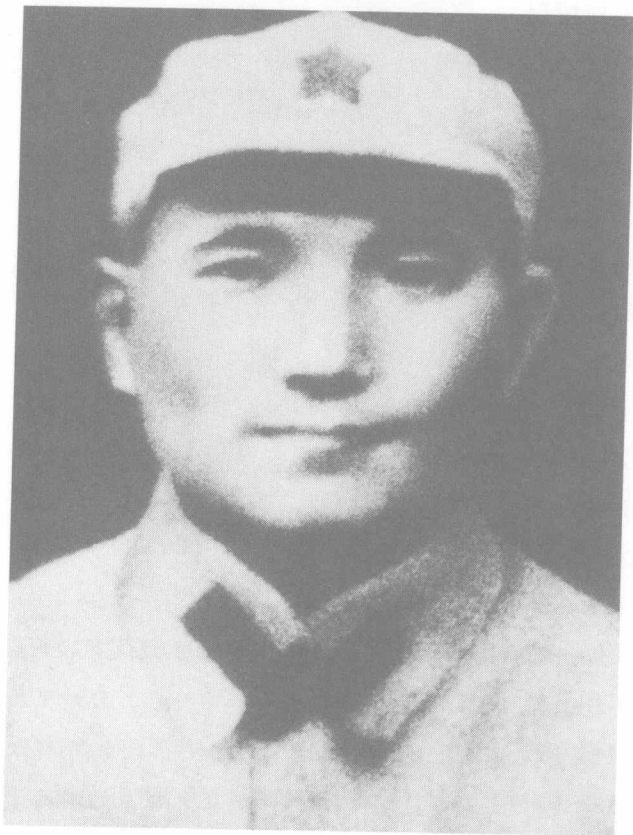
1932年5月，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不久，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

自从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职务，只分配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但是，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坚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坚决抵



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邓斌）和张云逸、雷经天、俞作豫、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4、5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七军和红八军。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起义后任中共广西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红七、红八军政治委员。

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因而成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必欲整倒的一个严重阻碍。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左”倾教条主义终于向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展开了“进攻”。而且，这种“进攻”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1933年2月20日，“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批判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以反会、寻、

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左”倾教条主义正式揭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为了否定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寻乌事件”被“左”倾教条主义作为一件大事提了出来。当时，在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一切机会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可奈何。最后，在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军民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出了寻乌城。这样，被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占领的革命根据地亦得到恢复。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诬蔑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毫无道理地开展了反对“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错误的批判和严厉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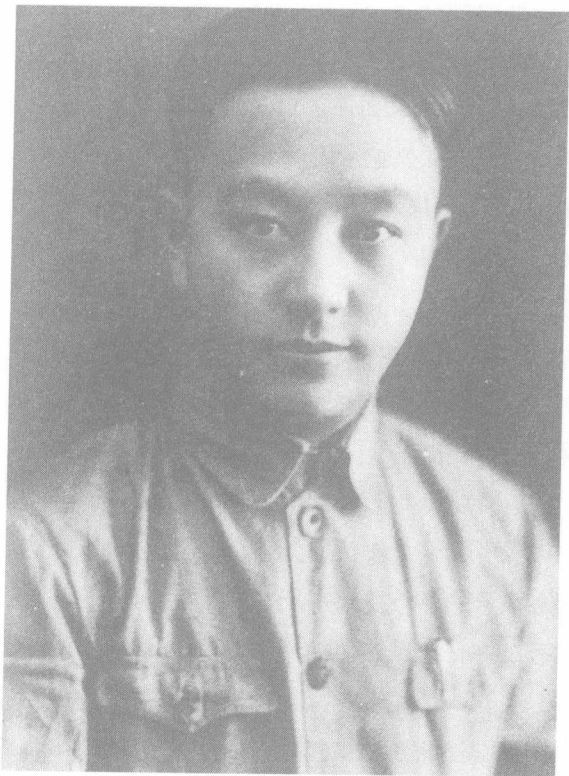
本来，1933年春天，邓小平已经离开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奉调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对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整个工作，遭到了否定，并被错误地扣上了“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大帽子。

4月16日至20日，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主持下，江西省委召开了江西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以总结江西工作为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对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打击。此后，会昌、寻乌、安远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凡是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领导干部，均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的批判尤为激烈。

毛泽覃，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弟弟。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

粤、湘边界地区。1928年4月，随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1929年参加赣西南根据地的开辟，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1930年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由于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抵制，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等职。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在安源等地从事工农运动。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



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二营党代表。1929年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委员、红军团政治委员和师政治委员等职务。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以后，参加了长征，曾任陕北靖边特委书记。1935年冬牺牲。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名，提出了一系列更“左”的观点。不久，王明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掌握了中央领导权。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转战到陕北。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创建中共寻乌支部。1928年领导了寻乌“三二五”暴动，开展武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创建中共寻乌支部。1928年领导了寻乌“三二五”暴动，开展武

装斗争，是乌寻中共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任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后，历任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工部秘书长，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红十一军军长等职务。由于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受到批判，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在广东龙川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根据“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要求，中共江西省委于1933年4月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位江西省委工作人员回忆：

会议由苏区中央局派来的代表主持并作主题报告。“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上厕所，我跟过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用现在的话讲是出什么风头)。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但没有多久，她又回到县里了，我在省里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有些事看不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批判“邓、毛、谢、古”的会议，并由此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1933年5月4日，临时中央代表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邓、毛、谢、古坚持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情况的报告。听了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面之词，不明真相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